

龍年的悲愴

《河殤》・爭鳴與回應



蘇曉康・金耀基・杜維明

林毓生・沈清松

朱維鈺・許紀霖・金觀濤・麥迪遜

劉笑敢・王魯湘・謝選駿

龍年的悲愴

《河殤》・爭鳴與回應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HONG KONG POLYTECHNIC
LIBRARY

責任編輯 林道群
裝幀設計 陸智昌

書名 龍年的悲愴——《河殤》·爭鳴與回應
編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編輯部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印次 香港灣仔譚臣道十七—二十三號五〇四室
版次 一九八九年四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三十二開 (130×184mm) 110〇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721·0

© 198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目錄

龍年的悲愴

——關於《河殤》的札記

蘇曉康

1

中國意識危機和傳統創造的轉化

林毓生

45

《河殤》·中國文化何處去？

杜維明

51

《河殤》與中國人的反思

金耀基

62

我看《河殤》

沈清松

76

文明衰落期的希冀和悲壯

——《河殤》斷想曲

許紀霖

87

《河殤》何傷？

朱維錚

102

《河殤》與西化思潮

劉笑敢

119

《河殤》與東西方面臨的挑戰

——金觀濤和麥迪遜 (Richard Madsen) 的對話

張躍宏記錄

147

《河殤》的商榷·····

蘇曉康

168

失去家園的漂泊者·····

王魯湘

178

中國人的黃河心理·····

謝選駿

183

龍年的悲愴

——關於《河殤》的札記

《河殤》撰稿人 蘇曉康

一、中國人的凶年

九月九日那晚，我和王魯湘去謝選駿家聊天，聊至深夜時，魯湘忽然叫道：

「唉呀！今天不是毛澤東的忌日嗎？」

三人頓時默然。

我瞥了一眼電視機，心想：今晚的《歷史上的今天》會說些什麼？可惜沒看。繼而又在心裏問自己：怎麼一點都沒記起這個非同尋常的日子？當年那麼強烈的刺激連同那個創痛巨深的歲月怎麼僅僅過了一輪就淡忘了呢？

十二年，正好一輪。中國人又遭遇上龍年。十二年前，隕石墜落，北方塌陷，

天崩地裂，蒼龍死去，中國人彷彿恰恰在這大災大難中熬滿劫數，獲了解脫。難道下一個劫數這麼快又來了嗎？

龍年，歷來被中國人視為凶年。這種觀念是出自「陰陽」、「五行」的天人感應之說呢，還是歸之於我們祖先幾千年的歷史總結？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妻子屬龍，每逢她的本命年，她都要尋一根紅繩子繫在腰上以避災，而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至少十二年前的那個龍年的多災多難，彷彿也是一個近乎宿命的「歷史經驗」。

於是，龍年可畏。

公元一九八八年在中國確乎是一上來就呈現出某種不祥的、躁動的、神州惶然的景象。經歷了一連串全國震驚的事件後，便有民謠傳出：「飛機打滾，火車親嘴，輪船沉底，物價沒準」。當上一年的森林大火的灼痛還留在人們心中的時候，重慶空難，江南瘟疫，物價飛漲等一齊襲來，很快就將中國人意識深處的恐懼感誘發出來了，大伙兒都不約而同想起了十二年前……

據民間傳說，今年春節剛過不久的一個深夜，在關外某省城郊區的公路上，一個司機正匆匆驅車往家趕。忽然，車燈下照出公路上橫臥一條青蛇，他猛地剎車繞

開。跑了一陣，又見橫臥一蛇，再繞開。此時公路上閃出兩個女子，攔住此車，自稱她倆便是兩蛇，爲謝司機不軋之恩，特泄露天機於他：龍年有凶，回家速放一掛鞭炮，即可禳災。不久，這座城市在某天夜間全城不約而同鞭炮齊鳴，翌日衆人相見紛紛作揖道賀：「過年好」。此舉隨即傳入關內，迅速風靡各地，蔓延許多城市。農曆五月初一（六月十四日）夜裏，太原市也忽然鞭炮震耳欲聾，不少人惘然不知何故，待打聽方知龍年要過兩個，才能消災避難，而且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被一搶而空，皆稱吃了可以「平安逃離」（蘋果、鵪鶉蛋、桃、梨）……

我至今記得很清，一九七六年之初，在周恩來逝世的那個不祥的春天裏，中國人的臉上都蒙着一層陰霾，天氣彷彿一直也是陰沉沉的，全國到處流傳着可怕的譏諱凶言，及至夏天，唐山果然陸沉，旋即毛澤東駕崩。古老的天人感應竟是那樣靈驗，而民間似乎是預卜先知的恐慌反應，究竟是一種有規律可尋的社會——心理現象，還是真有某種神靈的預言呢？無論怎樣，「世紀末」心態在龍年兩度出現，讓我相信龍年的不祥或許是有道理的。

我們的《河殤》，便是在這不祥的氛圍中寫出來的。

一九八七年的最後一天，我開始着手寫第一集《尋夢》。

當龍年悄悄來臨的時候，我彷彿什麼也沒有意識到。走在北京街頭，忽然看見滿街的龍——十字路口的巨型廣告牌上畫出一個被打扮成可愛的娃娃相的龍，伸着兩隻掙掙的觸角手舞足蹈地在歡迎誰；霓虹燈上閃爍着五彩繽紛的龍；特別是北京車站對面新落成的國際飯店門口的柱子上赫然盤着兩條金碧輝煌的老龍給人印象極深……原來，人們把一九八八年定為國際旅遊年，中國人用來招徠外賓的象徵恰是龍這個中國最標準的「國粹」。

王魯湘戲謔道：「這個古老的圖騰居然也有現代實用價值。」
我却在想：這不是再明顯不過的一種尋夢嗎？

當我從《黃河》攝制組航拍的畫面上看到雲霧繚繞下的黃河時，我只想到了血管。因而，我和夏駿最初構想《河殤》這部片子的時候取的題目叫《大血脈》。我們想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談談黃河文明的興衰，就像探險隊上溯黃河源頭一樣，去探尋華夏文明的源頭。現在我才明白，橫臥在那文明的源頭的原來是條龍！有趣的是，這個偉大的象徵物不是在原始圖騰或青銅器上，而是在大都市的街頭上讓我們捕捉到的。

其實，黃河即龍。這個觀念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懷疑的，就像人們決不懷疑自己是龍的傳人一樣。然而，中華民族爲什麼要崇拜這麼一個形象凶暴的怪物呢？

此時恰逢趙瑜從山西來京修改他的《強國夢》，我邀他住在劇組，每每徹夜長談。那晚，他邀我和魯湘、夏駿等去看電影《老井》，那是他的好友鄭義的扛鼎之作。太行山人同水的那種力量懸殊、幾近絕望的搏鬥，使我忽然明白了，水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直到今天也難以擺脫的特殊文明意義。我們被深深的震撼。

「你找到一個不用翻譯的〈世界語〉——水」。在趙瑜慫恿下，當晚我給鄭義寫了封信：「在西方人看來——馬克思就是這樣看的，東方那悠久的專制主義實際上同水有關係。大河流域民族的全部文明就建立在與水搏鬥的生存偉力和被水制約的悲劇命運的兩難基礎上。民族的心態和性格，便在這兩難中被扭曲和異化……」。

龍，正是這種心靈扭曲所產生的幻影和寄托。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逼得中國人不得不選擇某種專制集權的合力來應對，而這種專制集權本身又變成另一種無法違拗的超然主宰，在自然暴君之外又給中國人加上了一個社會暴君。龍便獲得了雙重的象徵。

當夏駿從一部外國人拍的電視片《中國的心》中找到一個畫面——一條張着血盆大口的惡龍從天邊翻滾而來的時候，當我忽然想起一回張明敏在電視裏身着龍袍馬褂作悲涼狀唱《龍的傳人》的時候，當我們從大量資料中發現無數拜龍、舞龍、賽龍舟等等鏡頭的時候，我們便下決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好生說一說這老東西了！

我並未料到後來這竟猶如刨了祖墳似的讓某些人暴跳如雷，罵我們敗了中國人的興。

我也並未料到碰了這老東西竟會讓那麼多人難受，如一些學者、畫家、海外名人等等，對我們嚴詞批評，大意無非是說這些象徵物是褻瀆不得的，否則就會傷了我們民族的元氣。我倒覺得這元氣本已傷盡，靠那條老龍彷彿也難強撐。我認為，既然如一些學者所說，象徵物是非常複雜的，那就可能是見仁見智的。難道把黃河說得那麼仁慈、把長城說得那麼偉大、把龍說得那麼神聖，不也有點片面嗎？何況，它們之成為正面的偶像，似乎並非古已有之，不過也是近幾十年的事情。給它們注入某種政治文化的含義而古為今用者，似乎也是取其一義。何故就不許我們從別一角度也談談新的見解呢？難道這就會讓天塌下來嗎？況且有一點是不必擔憂的，我們反思自個兒的圖騰，還不至於使它在外國人那裏失去魅力而影響外匯的收

入。

說到元氣，趙瑜這小子倒頗有些眼力，年初住在我們劇組修改他那篇《強國夢》時，已預言這次漢城奧運會中國至多拿五塊金牌。果然不幸被他言中。

我是《強國夢》的第一個讀者。大概因為我對一方面大吹大擂要當「體育強國」，而另一方面却是神州上下都對氣功頂禮膜拜的那種世態頗生疑竇，所以讀了《強國夢》，我便體味到當代中國人的心態：再也輸不起了。

近百年來，我們老是輸。最早輸給英國人，接着輸給八國聯軍，後來又輸給日本人。好不容易把日本人打跑了，新中國也着實讓炎黃子孫在世界面前揚眉吐氣了一陣子，誰知短短三十幾年光景，待我們從一場自己招自己的內亂中醒過來，才發現我們竟與坦桑尼亞和贊比亞這等窮國為伍，連南朝鮮、新加坡、台灣都跑到我們前面去了，而日本人則笑哈哈地帶着他們的東芝、日立、豐田、皇冠、雅馬哈和卡西歐又來了。

中國人在瘋搶進口彩電和冰箱的時候，大約並沒有意識到這其實又是輸了一場，因為，大伙兒覺得「中國姑娘」正橫掃全球所向披靡哩、乒乓球正稱霸世界哩、聶衛平正殺得日本人丟盔棄甲哩……從日本人製造的彩電上欣賞中國女排可勁

兒揍日本女排，那股滋味別提有多舒坦了。在這興頭上，誰要敢輸，還不蹦起來「操你祖宗八輩」？

這當然不能怪老百姓。沒人告訴他們如今龍的傳人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體育本來就是一劑迷魂湯。可憐的中國老百姓，把他們的全部熱情崇拜連同喊破嗓子的喝彩，都奉獻給能讓他們覺得自己挺強壯的體育明星們，自個兒却病怏怏的去尋氣功師運小周天。

那天，我的《尋夢》也寫不下去了，便拉着趙瑜到一個氣功班上去接接「仙氣」。滿屋子京華名流都極虔誠地聆聽那位曾經鎮服了各大學、研究機關和新聞單位的大師在那裏神吹海聊，個個都伸着手掌竭力去接受「仙氣」。我雖然默默反復告誡自己要心誠，但手掌上硬是半點感覺都沒有。喪氣之下回頭看趙瑜，他竟昏昏然抱頭大睡起來。

回去的路上我埋怨趙瑜不該睡覺。「看看來這裏拜氣功師的都是什麼身份的人，你就知道中國人都癡到什麼程度了。」

這自然不僅僅是一種「羣衆體育現象」。「我一進那屋就發困」，趙瑜說：「心裏也挺癢扭。堂堂首都怎麼叫這幫張天師的後代弄成這般光景，真給人一種

「世紀末」的感覺。」

龍年，多事之秋。天災人禍，氣功風靡，謠諑蜂起，搶購狂潮，漢城失利，改革受挫。《河殤》在這種氛圍下播出，能吉利嗎？

二、上帝的棄地

此時王魯湘也正在爲他的第二集《命運》煞費苦心。

一個千年古國的悲壯衰落，要用一部電視片去加以解釋，顯然是太困難了。我們是讓魯湘去做一件幾乎辦不到的事情。更何況，要讓這樣一個北大極優秀的哲學碩士、一個經過充分的抽象思維訓練和嚴格的治學精神陶冶的「書呆子」，像詩人一樣游刃有餘、雄嘆悲放，也是一件受罪的事。魯湘整日價躲在他那間小屋裏遍覽羣書，常常熬到深夜未得幾行字，第二天便會一臉憔悴地對我說：「咱們這般指點江山，評說千秋，會不會貽笑大方呢？」

本來，我和夏駿搞出《大血脈》構想後，特意請他來作了一番論證，他曾拍案叫絕，讚之曰：「黃鍾大呂」，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

眼下，我們面臨着一個從純學術走向電視的艱難轉換。本來，越是作學問的人，總是越要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裏搞形而上，講究「大膽設想，小心求證」，而不管現實世界的翻天覆地、死去活來。這或許也是中國啟蒙的一種艱難。

記得後來我們搞出脚本後去拜訪金觀濤、劉青峰夫婦，邀請他們參與時，夫婦倆都面有難色。他們恐怕也是不相信電視能搞精英文化的。我當時心裏着急，衝口激將了一句：

「金先生，您如今也是名播海外，著述甚豐，但不知您想過沒有，您那個〈超穩定結構〉說，中國有幾人知曉？如果到電視屏幕前對着幾億觀眾親口說上幾句，那會是什麼效果？」

金觀濤眼神裏顯出了掩飾不住的興趣。

讓電視與思想聯姻，這是二十五歲的導演夏駿追求的目標。這位學電視出身的文學碩士在讀書時就膩味電視的平庸，只對「文化熱」有濃烈興趣，結識了首都學術界一大批名家。待他畢業分配到中央電視台時，正趕上中日聯合攝製《黃河》。他以爲這是一個機會。結果在劇組裏泡了一年多，眼睜睜看着大量極好的素材被平庸地處理了。三十集《黃河》依然是風土人情的泛泛之作。搞電視的人同搞理論的

人一樣，認為電視不是精英文化，並把這個小子看成是好高騖遠之輩。

夏駿的孤獨我是能深深感受到的。他不像他的同齡人那樣浮躁、誇飾和眼高手低，他也不像我們這一輩人那樣圓滑、世故和瞻前顧後。他的少年老成常常讓我覺得很奇怪：被稱之為「文化營養不良」的這一代裏，怎麼偏偏出了這麼一類早熟的品種？

這小伙子極有心計。他知道讓魯湘和我丟掉「書卷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去親眼看一看黃河。隆冬時節，我們一行五人從北京飛往延安。

王魯湘後來回憶道：「飛機掠過晉陝峽谷時，人類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迹，使我很驚訝。從飛機上看下去，山西的地貌，很像軍事地圖，到處是等高線，說明坡地都被改造成水平梯田，頂端像一個個蛋卷——我強烈地感覺到山西人的勤奮，並想到大寨。飛機一過黃河，地貌突變，等高線消失，大地竟然變得醜陋不堪，到處是極陡的坡地，鬆散乾燥的黃土像掛在坡上，隨時可能被兩水沖走。由於重力垂直切割，形成一根根土柱、土塔，像千年古堡塌圯後的朽柱，像大火過後的森林枯木。人類的行為——不管是有所作為還是無所作為——都要對此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陝北高原的乾旱、貧瘠和那梁梁茆茆之上陝北人的窮困、封閉、愚鈍、無奈以及他們極強的繁殖能力，都使我們深深感到大自然的枯竭和人類把它掠奪到無以復加時的絕望。這好似那曾經非常輝煌的華夏文明猶如一個垂暮而淒涼的老人，還固執地滯留在它那凋蔽荒蕪的故鄉等死。生於江南水鄉的魯湘站在冬雪覆蓋的山梁上，對着一片靜寂的佈滿着雨水切割留下的累累傷斑的羣山喃喃道：

「這真是一片上帝的棄地呀！」

《命運》的主旋律——我們祖先對土地的眷戀和難以超越大陸的悲劇性局限，王魯湘或許正是在這時獲得的。

包裹着這個被遺棄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古老文明的，便是長城。

對我們民族來說，它和龍一樣，是一個不可褻瀆的偉大象徵。

可我們的電視片，恰恰需要借助這些象徵物。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有利於把概念的抽象的思想轉化為具體藝術形象。都是祖先贈與後人的遺產，幹嘛只許頂禮膜拜不許批判反思？祖宗們還允許孟姜女在兩千年前罵長城呢！

最早把長城這個象徵物的文化含義開掘出來的，恐怕要數謝選駿。在他那本《神話與民族精神》一書中，已經把內陸防禦型的「長城文化」同西方的「海岸文